

哲学如何回应时代变迁

□ 干春松 潘 宇

中国近40年来的发展，走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中国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人们认识上的困境：一方面，人们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欣喜，并逐渐增强了近代以来曾经失去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道路因其独特性而难以归入世界其他发展模式，因此，中国的成就受到了西方一些学者的质疑。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偶然论，都是这种思路的产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一些冷静的思考者，更需要一些深刻的作品来理解并描述我们的时代，而哲学的分析是最值得期待的。

在这近40年中，哲学由一个思想引领者的角色逐渐退居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虽然从历史看，哲学的繁荣往往意味着时代的大变革，但哲学的缺席却会让时代失去方向感。所以，总有一些哲学工作者不会放弃自己的使命，与时俱进地记录着这些变迁背后的历史和思想的世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剑英学术自选集《时代的哲学回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为坚定文化自信构建哲学基础

近代中国的危机，重要特征之一是丧失了文化自信。对此，赵剑英写了一系列文章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构》一文中，作者认为，文化认同的危机背后是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所导致的认识世界的宇宙观和历史观的彻底颠覆，由此，中国似乎必须走出自己的传统才能觅得发展之路。这造成了中国自身的历史积累、文化资源与中国发展的某些方面呈现出背道而驰的局面。文化信心的丧失导致中国自身的民族凝聚力降低，国家发展缺乏内在的动力。所以，近代以来的知识界和政治家们一直在寻求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和继承自身文化传统的融合。在《文化认同危机与建构社会基本价值观的紧迫性》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化认同危机不仅危及文化安全，而且必然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他认为，应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建设，基本价值观是“为不同社会群体和各阶层所认可并接受的价值观，比如：尊重生命、仁爱互助；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种族和谐、信仰自由等”。该文章发表于2005

年，充分说明了作者对于重构文化认同价值基础的先见之明。

针对许多人仅仅将文化看作软实力的观点，作者认为，从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的支柱性产业的角度，它可以被视为是“硬实力”。文化对内可以体现为认同力、亲和力和凝聚力；对外则可以体现为导向力、吸引力、效仿力、辐射力，这就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总结“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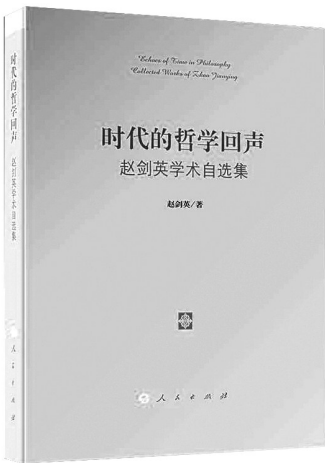
作者长期以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还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参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并被师长所看重。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所形成的新的论域。这方面讨论最为值得肯定的，是哲学工作者自觉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发现其思想的活力，并摆脱长期被教条主义所束缚的思想探索。实践的维度则直指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这个问题上，他撰写了《实践学：实践问题研究的新视野》《试析实践活动运行机制》《论人类实践形态的当代发展》等文章，展现了他进行哲学抽象的能力。

作者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领导职务，因此，他与全国多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一起，自觉地担负起引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构等工作，并创办“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还撰写了大量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文章。比如，在《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当代建构》(2005)一文中，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展开对话，克服这几个学科之间长期缺乏交流、对话甚至互相轻视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要紧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问题之外，还要凸显民族性和开放性。在凸显民族性的层面，一是要“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予以新的阐发”；二是要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成果的哲学思想；三是要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及据此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架构需要中国的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给予学理上的深入挖掘和‘合法性论证’”。这的确是涉及了目前哲学社会科学自主性研究的核心。这篇文章写于10多年前，提出要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制度体系的学理性论证，这在学术界、理论界是比较早的，可见作者的理论敏锐性。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解释社会发展道路时，如果削足适履，强以中国经验套入根据西方经验而总结的模式中，难以有所发现，难以构成自主性的话语体系。因此，中国哲学客观存在着如何走出合法性危机，创建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尤其如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直面中国的问题，从中国的经验中获得发展的动力，从而提炼出回应时代问题的新认识新规律，这也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哲学的使命。

作者的思考之所以能在抽象理论思维和中国实践的激荡中获得充沛的理论活力，或许与他学术研究的独特经历有关。他对于现实工作中的理论需求有深入的体察，同样也知道什么样的理论才可以反映现实的需求，这样，他的文章就展现出鲜活的生命力。作为这些思考的结集出版物，《时代的哲学回声》一书，值得所有关注中国发展的理论爱好者关注。



《时代的哲学回声——赵剑英学术自选集》，赵剑英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书而思

从《老乡》看城市化大潮中的农村问题

□ 温铁军

近来，在朋友推荐下，我读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老乡——对中国西北一个移民村庄的一线调查》一书，读后感慨良多。这一报告文学既有阅读价值，也非常有现实意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城镇化大潮中农村问题的综合案例。

中国西部农村的一个微末“切片”

这本书用纪实手法，带我们走进了黄土高原深处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上马洼村顾山村。

我读这本书，第一印象就是写得比较客观，以媒体人的独特视角，用非常朴素的语言，反映了一个族群150年的变迁，描绘城市化大潮中的中国农村的真实图景，记录下西北农村的生存状况、民族风情、未来期盼。没有宏阔的铺陈，没有悲悯的俯视，只是客观的白描，这对当前的媒体报道而言，是一阵清风。

这本书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走访，如同显微镜般冷静观察着中国西部农村的一个微末“切片”，而构成这一“切片”的细胞，就是顾山村的一个个普通的村民：房东张志选、阿匄马西平、赤脚医生勉成福、包工头张治忠、民办教师张万钧、养鸡专业户张建福、11岁的学生张树丽、辛劳的母亲哈如梅、开“超市”的张君兰、开饭馆的姬秀花、当了13年村干部的张万山、一个人种了30亩地的张万武、72岁还在放羊的马明兰、在银川打工的张平……记者的调查涵盖了顾山村几乎各个群体、各种身份，以及各个年龄层次的目标个案。

可以说，顾山村，差不多所有的人都面临来自城镇化的冲击和挑战，顾山人也是中国遭遇共同命运的亿万“村里人”的一个缩影，非常具有典型性。

关键让农民真正成为“主力军”

最近几年，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和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直接面对分散农民的“成本”巨大，往往出现对基层工作投入大，效果却不一定好，甚至有些资金打了水漂的局面。而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农村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载体。

分散小农兼业化经营状态很难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农村已出现逐渐“空洞化”的趋势。在信用社、供销社系统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共同发展的大环境下，对于大多数普通村庄而言，亟须探索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土地三权分离条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比如，以村庄为单元通过群众路线把村民组织起来，建设综合性合作社，就是一个好方向。即以综合性合作组织为载体、多样性乡土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为内涵、党政主导的群众路线为手段，把这“三位”服务于作为“一体”的美丽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只有农村群众利益和资源环境可持续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发展能综合协调“三生”，即生态、生产、生活的组织，也才能使国家多个部门下达的优惠政策，在基层组织的载体上得到贯彻落实。

给顾山人留一条回家的路

移，还是不移，反映的是生态脆弱地区老百姓难以自主抉择的问题。虽然政府是从长远考虑，认为盖了房子村民可以搬过来了，但还应该征求村民对于生计问题的意见。在村里，本来每个家庭的住宅就不仅是住房，同时也是仓库、棚圈和庭院经济，人与牲口“住”在一起，不怕丢失。村里大家都熟悉，形成熟识社会，可相互委托照顾老人小孩及牲口。城镇化往往意味着“去熟人化”，牛棚圈舍都得按城市的卫生规范建在

村外，就更可能出现牲畜丢失等财产安全问题，也难以搞好“三生”。

很多农村青年甚至年纪偏大的人也外出打工，获得现金收入，以支付在城市的开支。这些外出打工的农村人既回不去农村，又进不了城市。这本书中也写到，相当多的农村出来的人并不适应城市的生活，最后还得回到生态脆弱的小村，而他们受过较好教育的子女才有能力在城市就业和生活。

我们要给顾山人，给老乡们留一条回家的路。在这本书里，一位老乡对作者讲到，“我也想到城里去生活，可是到了城里，在啥地方找钱呢？老婆娃娃跟着喝西北风呀”。只有城市农村公共服务逐渐均等化，这是追求现代化的前提，而顾山村老乡们盼望的正是在自己的家门口享受到新农村建设的成果。



《老乡——对中国西北一个移民村庄的一线调查》，吕廷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书海泛舟

郭迎光同志主持完成的《武家堡调查》一书的初稿，我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读到。那是2015年底，我们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为了更多地听取各方面对制定农业农村政策的意见和建议，邀请了有关省区农办的同志召开座谈会，了解到山西省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省长郭迎光同志主持的对武家堡村的调研活动已持续了一年多，并已形成了不少调研分析资料，便向山西的同志要了若干，以供文件起草组的同志参考。由此，我有幸在2015年底就读到了《武家堡调查》的初稿。

郭迎光同志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工作。他到山西省任分管此项工作的副省长后，我与他交往的机会就更多了。在多年的交往中，深感迎光同志是一个对农民群众有深厚感情、对做好“三农”工作充满激情的人。他常对我说，山西农村的情况与他以前工作的地方有很大不同，而山西不同地区农业农村的情况又有着明显差别，因此只有加强对农村的实地调查研究，才能对山西的“三农”工作有发言权。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主持开展历时一年多的对武家堡村调查的心路概括。

关于对《武家堡调查》所反映的情况和得出的结论，我不必赘言，读者自可体味。在此，只就迎光同志主持这次调研活动的本身，谈点自己的感受。

做农村工作的同志都知道，深入开展进村入户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三农”工作的基本功和看家本领。我国农村地域广大，各地的地理环境、社会风俗、发展水平等都各不相同，当今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正处于快速转型之中，而从事农业农村政策的研究人员，却大多生活在城里。因此，要真正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有效政策措施，唯有持续地开展对各地农村的深入调研。回想起农村改革之初，当“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刚现出“小荷才露尖尖角”之际，全社会就迅速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农村调查热潮，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同志，到各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再到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科教人员，几乎都在从事和谈论着农村调研。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基础，才加快促成了全社会



《武家堡调查》，郭迎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对农民迫切要求改革人民公社体制这一强烈愿望的理解，才加快形成了党中央推动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方针政策，才使农村成为了整个中国改革的发轫之地。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几乎尽人皆知，但践行起来其实并不容易。我早年读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也曾下过决心要到一个村里去蹲上几个月，好好剖析一下一个村庄内部的经济社会关系。但30多年过去了，这个心愿却始终未能实现，想起便觉汗颜。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乃至整个国家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分工分业的不断细化，导致政府的工作头绪不断增多；交通、通信条件的持续改善，也使得了解基层情况的便利程度大大提高，但这也使得我们对农村的调研在方式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我自身的情况来看，现在到农村去调研，即便是到了村里，也是更多地以听汇报、看材料、召开座谈会为主，然后再到若干农户家里走马观花式地看一看，而那种在村里住上一两夜的情况是很久都没有了。现实情况和条件确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到农村去搞调查，如果都要实行找房东、吃派饭、住几天的做法，可能也确实已经并不现实。但是，要想了解村庄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要想听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意见和建议，总需要获得调查对象的信任。否则，人家根本就不了解你，当然也就只能是应付一下你提出的问题，很难深入下去。回想起我自己结交的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朋友，基本上都还是二三十年前因为在他们的村里住过才有了这样的关系。现在大家都意识到

深入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的必要性，因此派出了如驻村扶贫工作队、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这些都还不能替代农村政策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对农村的深入调查。

郭迎光同志所主持的对武家堡村的调研，为我们开创出了一种新的农村调研形式，那就是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持续不断地到一个村去做连续性的调研，有时间就住一夜，没时间就下次再来。迎光同志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中，连续30多次到武家堡村，差不多每两周就去一次，谈遍了村里的578家农户，与不少村干部和农民都成了熟人甚至是朋友。这样了解到的情况自然面更宽、程度更深，也更为真切。当然，对一个村的调研，即便再深入也不能代表全面。但是，开展对一个村庄的深入调研，对于了解村庄的经济社会结构、把握农村变迁的脉搏、懂得如何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等，却十分重要。因此，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对于农业农村工作者而言，像武家堡式的调研却仍然是极为必要的。

序与跋

好书推荐

《撸起袖子加油干：党员干部的12种干法》，路大虎著，东方出版社出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将蓝图变为现实。本书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心态上不想干、能力上不会干、执行上干不好、结果上干不对的种种问题，特别是“不干不行，干却理不清思路、找

《商战新论：对抗的智慧与企业战略》，周松波著，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融汇中华传统智慧和现代企业管理思想，深入研究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军事战略思想与西方现代企业战略管理思想的异同，结合中外企业竞争的实战案例，从战略分析、战略规划、战略实

不到门路、走不出事业路”的难题，把握党员干部思维、行为中的痛点、难点、盲点、困惑点、关键点、着力点、突破点、制胜点，提出党员干部的12种干法。本书主题立足大局势、大环境，内容从小处着手，从细节分析，案例丰富，叙论结合，真正帮助读者认清形势、理清思路、明确任务、优化方法。

施与战略控制四个方面论述了在21世纪动荡的超竞争商业环境中取得竞争胜利的基本战略理论以及进行企业战略谋划和管理的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兵法中提出的为将之道进行了富于时代性的新阐发，以“智、信、仁、勇、严”五字箴言为核心概括出现代企业战略家的基本品质。

